

殖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 香港与澳门的文化大革命

[美] 凯瑟琳·克莱顿

导言

1966—1967年冬天，葡萄牙人管理的中国南部沿海小城澳门，发生了一系列反政府示威游行、暴乱和联合抵制事件，造成8名中国公民死亡，另有大约212人受伤，62人被捕。1967年春末，澳门的邻居香港，也爆发了示威游行、暴乱、工厂停产和炸弹爆炸事件，从1967年5月到12月，共有51人死亡，832人受伤，4321人被捕。¹在此之前，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和澳门，不仅一直没有受到毛泽东极端政策的影响，反而成为避难场所，为那些逃离中国的居民提供庇护，有的为了逃离共产党赢得的胜利，有的为了躲避“三年自然灾害”的贫困，还有的因为受不了60年代初农村运动的动荡。²但是，当大多数观察家看到戴着红袖章、挥舞着红宝书的学生带头示威游行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已经抵达这两座城市。

这些暴动不仅伤害了那些直接受其影响的人，事件及其后果也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殖民政策、殖民统治以及政治认同，这些影响在事件发生40年后仍然余波未尽。的确，尽管澳门“一二三事件”——1966年12月3日，澳门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暴动，与1967年香港暴动各自有不同的方式和原因，但是通常都被视为两地历史的转折点。澳门的葡萄牙人从那时起在当地失去了强有力的统治，澳门成了半解放区。香港的英国政府在接下来的20年中实施了社会以及政治改革，香港成为“亚洲的世界城市”。尽管在对文化大革命改变香港、澳门社会与政治前景重要性方面众说纷纭，但却很少有人调查亲历这些事件者是如何评价其意义的。

¹ 澳门的死者均为中国男性，伤者中有9名警察和一名士兵。不同资料显示不同的伤者人数：1987年，《澳门史》，香港：商务印书馆。（Huang, Hongzhao [黄鸿钊]. 1987. 澳门史 [Macau History].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商务书联].）和黄启臣：1999年，《澳门通史：缘故—1998》，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广东新华书店经销。（Huang, Qichen [黄启臣]. 1999. 澳门通史：缘故—1998 [General History of Macao]. Guangzhou: 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 distributed by Guangdong Xinhuashe Bookstore. [广州市：广东教育出版社：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都说是107名；Fernandes, Moisés Silva. 2006. Macau na Política Externa Chinesa, 1949-1979. Lisbon: Imprensa de Ciências Sociais. 根据葡萄牙官方报道，说是212名。香港的死者包括12名英国警察、士兵和消防员，以及39名市民（费勒斯1969）。

² 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部分去香港和澳门的移民都是非法的，所以没有可靠的难民统计数据。澳门大约有数万名难民，其中有数千人是想通过澳门去香港（Lopes dos Santos 1968）。香港大约有30万到300万难民（参见英格兰地 & 瑞尔 1974；威尔士 1993）。

本文试图初步整理出正在进行的一个口述历史合作项目的初步结果，这个项目的部分资金是由澳门大学赞助的。该项目有双重的比较目标：一是详细阐述香港、澳门和中国这三个有分歧但又紧密联系的文化和执政行为如何导致这种暴力及其后果；二是探索事件亲历者心中对这些事件的记忆，揭示香港和澳门居民当今的集体自我意识，包括香港与澳门居民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国大陆居民之间集体自我意识相当可观的差别。如今 40 年已经过去了，香港和澳门居民是如何理解这些事件的原因和后果的？从哪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他们这样认为的话），他们把这些看作历史的转折点？殖民主义在他们生活中意味着什么？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澳门，一方面是因为澳门事件不像香港事件那样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³另一方面因为时间和资助的限制，所以本项研究有关澳门的部分更加完备。但是当对比研究可以有效地突出双方各自的特性——如果两地有长期交互作用的历史时——无论是在我的分析中，还是我所分析的个体话语中，香港都发挥着—个对比点和连接点的作用。

背景与方法

本项目起源于我以前对澳门的研究，我当时探索研究的内容是，在 1999 年澳门从葡萄牙移交中国管理这个过渡时期，主权和殖民主义意识和经验是如何与中国观念相交的。当天安门广场上倒计时钟逼近政权交接的最后期限时，澳门出现了一些争论，如关于澳门葡萄牙人在场性质的争论，他们是殖民性质还是其他什么呢？又如，澳门主权模糊与争议的历史是如何塑造澳门居民作为中国人自身身份认同的，或者他们与其他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呢？

在早期研究中我发现，许多澳门和香港居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们与大陆人不同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个看法让我感到吃惊。他们认为，与大陆人的狂热、封闭相比，他们理智、开放，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更实际，所以没有受到极端主义言论的影响。在 1999 年凌晨发生的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中，我的一些在澳门的中国朋友（他们大都 30 多岁，在澳门出生或长大）虽然对北约的行为和站不住脚的借口感到愤慨，但是使他们更感困惑的是大陆对此事件的过激反应。他们认为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当时和那时一样，中国的学生一直被压抑着，所以易于发生暴乱，同样，由于国家不让学生们了解世界，使得他们更加天真幼稚；他们的

³ 香港暴乱已成为众多出版物的主题，包括张家卫：2000 年，《香港 67 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Cheung, Ka-wai [张家卫]. 2000. 香港 67 暴动内情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67 Hong Kong Disturbances]. Hong Kong: Pacific Century Publishing）。

，库珀，约翰：1970 年，《殖民地冲突：香港骚乱，1967.5—1968.1》，香港：斯维顿图书公司（Cooper, John. 1970. Colony in Conflict: The Hong 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January 1968. Hong Kong: Swindon Book Company.）；斯科特，伊恩：1989 年，《香港的政治改变与合法性危机》，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Scott, Ian. 1989.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和瓦尔顿，斯蒂芬·爱德华：1976 年，《边缘的枪声：对 1967 年香港左翼政治运动矛盾的研究》，Unpub. Diss., 锡拉库扎大学。（Waldron, Stephen Edward. 1976. Fire on the Rim: A Study in Contradictions in Left-Wing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Hong Kong, 1967. Unpub.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相比之下，只有两本葡萄牙语专著和一家地方广播电视文献对澳门“一二三事件”进行过探讨。

思想已被共产党通过大众传媒控制，被共产党利用以达到其目的。他们还把发生在北京和成都学生的抗议运动和澳门学生的抗议运动进行比较，与大陆的学生不同，澳门学生通过在校内外张贴抗议书，分发呈递给克林顿总统的请愿书以及组织燃烛守夜活动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义愤。

在我采访的其他一些澳门居民中，包括中国人、欧亚人和葡萄牙人，我们谈论了一些不相干的话题。他们时不时地会提到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作为澳门人与大陆中国人不同的标志和原因，还是其更真实的中国观的标志和原因。一位 80 年代初从上海来澳门的女士告诉我，澳门比大陆的任何一个城市更有人情味。严云翔 (Yan Yunxiang) 认为，“人情味就是人们关心理解其他人的一种基本情感，以及与之相关一套道德义务和社会准则”，这些思想源于儒家的道德标准 (严, 1966: 3)。她对我说，由于文化大革命，大陆的“人心都变了”；大陆人都没有了人情味，变得冷酷、阴险和十分自私。另外一位曾在澳门博物馆工作的中国女士告诉我，虽然红卫兵处心积虑试图割断中国人民和其历史的联系，但是在澳门，人们与自己过去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而且大家有更加深刻的中国观念。这些都强有力地证明了主权国家日常行为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她们认为澳门与中国的差别不是武断的政治界限，它标志着一个根本变化的界限，即对在当今世界作一个中国人不同理解的巨大差别。

这些讨论没有一个表明，澳门人自己曾参与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至于其原因，下面我将论及，一二三事件这个话题，在 90 年代的澳门实际上是个禁忌。但是，通过与香港朋友的交谈以及阅读香港学者对澳门问题的分析，我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由文化大革命所激发的这些事件还标志着澳门人和香港人的差别。我经常听到澳门人说，他们比香港人更传统，更爱国，甚至更像中国人，他们说，香港人已经出卖了自身的历史，正在变得过于个人主义和实利主义。相反，与邻居澳门的狭隘、保守和守旧相比，香港人经常为他们政治上的老练、开放性和改革精神感到自豪 (又见 Yee 2001)。他们指的是，澳门人普遍参与了一二三事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香港人普遍批判了左翼分子的暴乱，这一史实佐证了这种观点。

不管 (或者也许是因为) 这些事件对澳门和香港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状的重要性，事件本身一直都因为太敏感而没有彻底调查。实际上，在我们的项目进行中，我们经常会感到自己很愚蠢，因为我们试图去整理一段几乎没人愿意提及的口述历史。不管人们如何难以达成共识，认为重新审视这些事件是至关重要的，沉默的坚冰总会被慢慢地融化的。沉默源于难以找到中文档案，事件参与者年事已高和他们的记忆日渐模糊。但是，随着我们对事件调查在时空中的逐步深入，我们越来越发现人们渴望说出事件真相。基于这个原因，本文的资料来源于方方面面，有对在澳门、里斯本和香港的大概 40 位个人进行的采访，这些采访分别用广东话、葡萄牙语和英语完成；有来自里斯本、澳门和香港的葡萄牙语和英语档案材料；还有中文的新闻报道和二手资料。现有资料分析表明，显然不是共同反殖民运动和流血经历所形成之明确界定的当地形象认同，而是隔阂、一贯性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使得对这样一种共识必需保持沉默。

香港与澳门之比较

澳门与香港的相似之处不可否认。两地都是由珠江汇入南海处一块三角咸水区上的一个半岛和几个小岛组成的。在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之前，两地原本都是小渔村，村民大多讲广东话，还有少数福建人、客家人和水上人（蔑称蛋民）。在殖民统治下，两地都成为富裕的贸易港口，有大量流动人口和少数欧洲常住居民。两地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外国管辖下的中国领土”而非殖民地，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像不列颠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其他殖民地人民那样争取主权斗争，也都没有赢得独立的可能性。两地都经历了双方自愿达成的非殖民地化并都在 90 年代末“回归”中国（香港 1997 年，澳门 1999 年）。两地都成了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各自遵循其《基本法》进行治理，籍此确保两地在殖民地时期所形成的政治、司法和经济体制保持 50 年不变。

然而，香港和澳门又有根本的不同。在许多中国近代历史课本中，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割占香港被称为中国“百年国耻”之始，而关于葡萄牙人 1557 年如何在澳门得到一个自治的殖民地及其原因却模糊不清。这也就是说，中国长期以来认为，英国通过武力从清政府夺走香港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葡萄牙人留在澳门是得到中国皇帝恩准的，所以不能把他们算作真正的殖民者。作为全球贸易枢纽，澳门的黄金时代是从 1560 年到 1640 年，在此期间，明朝禁止与日本的贸易，从而使葡萄牙垄断了利润可观的丝绸和白银运输，随后澳门进入了一段经济衰退期，此后再也没有恢复。香港最初设法使自己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一个世纪后，即 20 世纪 60 年代，成为工业中心，90 年代成为金融中心。澳门的许多经济学家把这种差别归因于澳门领土狭小，陆地面积只有香港的 2%（澳门 28.2 平方公里，香港 1104 平方公里），人口不到香港的 7%（澳门人口 456,000，香港人口 6,900,000）⁴。此外，还归因于澳门港自然条件的限制，水位浅且淤泥堆积，因此澳门尽管是一个较早的现代贸易港口，却因为缺乏必要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条件而没能发展成为现代工业龙头。这也就是说，不像香港那样发展多元化和深层经济结构，澳门的经济主要依赖于一种、两种在其他地方被视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活动：外贸、贩运劳工、鸦片和黄金，房地产投机，当然还包括赌博。赌博在 1850 年被合法化，而且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其收益已达到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

最后，20 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英国的大不相同。这种意识形态，后来在葡萄牙世界（lusophone world）被普遍称为葡萄牙热带主义（lusotropicalism）。这种观念认为，葡萄牙的扩张不是经济掠夺，而且本质上比北欧殖民者更人道、更进步的种族和文化融合事业。与大英帝国主义自由贸易、法律规则和种族净化意识形态不同，葡萄牙热带主义鼓吹融合的有机生成力，津津乐

⁴ 具体数字会随时间变化，但两者的比例在整个 20 世纪大体没有变化，除了二战时期，由于葡萄牙的中立政策，许多人从香港和大陆逃往澳门。

道的是，小葡萄牙是在传播爱而不是战争，⁵所以才能够殖民统治世界这么多地方。萨拉查和其独裁的新国家，1932年至1974年统治葡萄牙三十年之久，他利用葡萄牙热带主义辩解说，葡萄牙在海外领地并非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海外省，是葡萄牙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74年的社会主义运动过后，萨拉查这种观念遭到批判和摒弃，当时葡萄牙放弃了其大部分殖民地，但是这种观点的残余依然存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听到了一个几乎与葡萄牙热带主义如出一辙的论调，这是一位在澳门的葡萄牙老师说的，她生怕我陷入认为澳门和香港相同的谬误之中。她说：“英国人占领殖民地，我们没有，我们很温和。我们只是在那里繁衍后代，没有对当地居民实行殖民统治。”她停下来然后用葡萄牙语又说了一遍，“我们走到哪里，就和那里融合到一起。我们派船开到世界各地，到非洲、美洲和亚洲，随船小伙子在当地娶妻，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了定居地。”

虽然这种说法已经被确切证明与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实际情况很不相符，葡萄牙殖民者其实像其他殖民者一样残忍⁶，是种族主义者，并且榨取当地人民，但是这种说法确实关系重大。它之所以重要是，它关系到澳门官方对欧亚群体的认可，16世纪后，这对葡萄牙帝国对澳门的日常管理是不可缺少的，这些欧亚群体指的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土生葡萄牙人，他们自豪地称自己为“东方葡萄牙人”。另外，这种非殖民说法也关系到葡萄牙政府对澳门所采取的不干涉政策是否有理，认为这种无照管政策是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好，这取决于你的看法，但这一政策确导致了澳门经济不发达、社会秩序混乱、人口受教育水平低等诸多后果。这种说法还关系到，许多葡萄牙人和澳门人对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暴乱及其意义的反应和看法。

1966年的澳门是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城，黄包车比注册的出租车还多，生活水平很低，工业薄弱，贫困和文盲率很高。⁷公共财源几近枯竭。少数军人管理着殖民地事务，他们与大众的沟通渠道很少，只能依靠由澳门人和富有中国人组成的一个小团体来维持两个企业联盟之间脆弱但有利可图的利益均衡，这两个辛迪加集团都是由少数当地中国精英组成的。在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澳门政府都是依靠出卖某个行业的垄断经营权来获得财政经费的，（如赌博、鸦片和电力买卖）。20世纪60年代，澳门最重要的两个垄断行业是黄金贸易和赌博。黄金贸易由何贤和崔德祺控制，这两个“红色资本家”领导着澳门中商会，与中共中陶铸、廖承志、陈毅、周恩来等中共温和派成员都有联系。1962年，赌博垄断权从何贤手中转至以何

⁵ 巴西社会学家Gilberto发展了葡萄牙热带主义理论，他曾在哥伦比亚跟随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学习，在他的文章*Casa-Grande e Senzala*中，Freyre把巴西的社会状况归因于葡萄牙殖民者的“过分狂热”。

⁶ 参看安德森，佩里：1962年，《葡萄牙与极端殖民主义的终结》，新左派回顾16:84-102。（Anderson, Perry. 1962. "Portugal and the End of Ultra-Colonialism." *New Left Review* 16:84-102.）和包克瑟，C.R.：1963年，《葡萄牙殖民帝国中的种族关系—1415-1825》牛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所。（Boxer, C.R. 1963. *Race Re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mpire, 1415-1825*.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中的例子。

⁷ 196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澳门人口169,299，其中7000人左右住在澳门半岛（另外7000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住在台帕，一部分住在Coloane）。但是，澳门前总督António Lopes dos Santos 1967年在里斯本的演讲中称澳门的真实人口数目接近27万。

鸿燊 (Stanley Ho) 为首的几个香港金融家手中, 与何贤相比有所不同, 虽然他们有时被称为“右翼分子”(汉纳, 1969), 但他们也只是为了追求利益, 并不太在乎政治观念。澳门是亚洲少数几个把这些暴利行业合法化的地区之一。⁸实际上, 正如莫瓦斯·席尔瓦·费尔南德斯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所说, 这两个企业联盟对这些行业垄断权的竞争是恶性竞争, 双方给葡萄牙当权者都施加了巨大压力。1966年, 当时的澳门总督安东尼奥 (Antonio) 就因为顶不住双方的压力而辞职回葡萄牙 (费尔南德斯, 2006)。葡萄牙是当时欧洲生活水平最低的国家, 几乎没有工业, 文盲率比澳门还高。⁹萨拉查政权时期, 虽然殖民地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是葡萄牙伟大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葡萄牙却在与殖民地的战斗中失败了。1961年, 葡萄牙的果阿、达曼和第乌被印度军队夺去了, 并开始了残酷的花费巨大的对抗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争取独立的长期战争。¹⁰葡萄牙“新国家体制”的右倾思想意味着葡萄牙不仅禁止工会, 对本国和殖民地新闻出版进行严格审查, 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7 年后依然拒绝承认中国政府。

1966年的香港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形, 人口增长了一倍, 由 1950 年的 200 万猛增至 1966 年的接近 400 万。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战后社会稳定带来的人口自然增长,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难民从大陆涌入香港。这些难民中的少数富有者利用穷苦大众劳动力低廉的优势迅速开始了在香港的产业经济。这些廉价劳动力除了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在香港居住的权力之外, 几乎得不到任何利益。他们住在拥挤的再安置房里, 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力, 享有最少的社会福利, 几乎得不到任何劳动法保护 (英格兰地和瑞尔 1975)。因此, 虽然大部分香港居民象他们在澳门的同胞一样生活不稳定, 但香港有基础牢固的中产阶级, 他们与这座城市有很强的经济和感情联系 (见卡若 2006), 香港的经济活力在给人们带来高期望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挫败感。¹¹由工党统治的英国有自己完善的工人实践主义传统, 已逐渐开始放弃其帝国主义财产和观念, 并且于 1950 年 1 月成为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 (见福尔 (Faure) 2003; 威尔士 1993)。

同时, 中国 (大陆和台湾), 都认为澳门和香港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依然保持对其大量投资的现状。¹²两座城市都是中共重要的外汇、黄金、商品和信息来源, 创造了超过一半的国家外汇收入。它们对中国很重要, 以至于此时中国不能重新收复

⁸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该组织为了确保汇率稳定禁止黄金买卖, 黄金由官方定价为 US\$35/OZ。因为葡萄牙从未签订这个协议, 因此不受协议内容的限制, 在澳门, 黄金可以合法地以自由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大量黄金在 1947 至 1974 年间被运往澳门, 其中很多被偷偷运往中国。

⁹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在 1963 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萨拉查世纪葡萄牙的惨淡状况, 根据政府自己的官方统计数据, 20 世纪 50 年代, 葡萄牙的人均年收入为 210 美元, 超过一半的人从事农业, 只有 24% 的人从事工业, 7 岁或 7 岁以上的孩子有 40% 是文盲。

¹⁰ 根据 Barreto (2002), 这些战争持续了 13 年, 消耗了 50% 的公共财产, 雇用了 20 万武装人员, 占葡萄牙整个人口的 2% 还多。

¹¹ 例如, 60 年代, 工资提高了三分之二, 就业率降至不到 2%, 生活贫困者从 50% 降至 16%。同时, 主要是由土生土长的中国难民构成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没有从英国政府得到任何权力和利益。

¹² 中共已经把香港和澳门从 1965 年拟定的 23 个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斗争目标中排除掉。

两地。面对西方国家的贸易禁运政策和与苏联的断交，中共考虑收回两地。另一方面，两座城市在饮用水、食品、电力和有利可图的贸易上（虽然大都是非法贸易）严重依赖大陆，因此它们也不想同大陆摊牌。两地的工人联盟、行业协会、学校、慈善机构、三人团体和实际上的大使馆内有大量国民党成员，同时，在两地的同乡会、工人联盟、学校和实际上的大使馆内也拥有同样多的共产党成员（如在香港的新华社和在澳门的南光公司）。香港和澳门的左翼组织庆祝十一国庆节，他们游行，放烟花，在主要的街道悬挂巨大的象征天安门和延安的牌坊。九天后，国民党组织庆祝双十节，他们也游行，点燃烟花，在相同的街道上悬挂象征武汉和南京的牌坊。虽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香港曾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支持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到了 60 年代早期，两党之间似乎达到了一种利益平衡。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发动，到秋天已经蔓延到遥远的南方。在澳门的左翼学校，如濠江学校，正常的课程已逐渐被学习毛泽东思想所取代，批斗会占用了越来越多的上课时间。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澳门，何贤作为中国人社区领导人和代表的权威受到一个来自更加激进组织的工人、学生和教师联盟的挑战。有报道说何贤曾告诉当时的澳门代理总督卡洛斯，他于 1966 年 7 月到 11 月期间管理澳门。这个团体开始称他为“葡萄牙人的走狗”。¹³

澳门：一二三事件

1966 年 12 月 3 日发生的事件源于几个月前。是年 7 月末，台帕的一个左翼组织向公共劳动部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得到允许拆除台帕（Taipa）村两座废弃的的旧建筑在原址建造一所小学。他们白等了 4 个月，没有收到政府的任何答复。¹⁴1966 年 11 月 15 日，几十个台帕居民决定自己动手解决：那天一大早，他们在这些房子周围搭上竹脚手架，准备将其拆除。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岛屿理事会管理者安德雷德（Islands Council Rui de Andrade）的注意，他命令台帕警察加以阻止。根据警方的报告，一小部分警察徒手赶到了事发现场，工人向他们投掷石头并辱骂他们。同时，葡萄牙当局请求中国商会的崔德祺出面干涉，他这样做了，到上午 11 点，群众平静离开。但是大概两小时后，工人们突然重新开始拆除，警察再次赶到现场，这次对抗升级为暴乱。村民向手持藤条盾牌和橡胶警棍的警察投掷砖块和瓶子，最后警察控制并清理了现场。在这次骚乱中，双方均有人受伤，6 人被捕。¹⁵

¹³ 参看“Incidentes em Macau: Relatório Respeitante aos Factos Decorridos em Macau no Período Compreendido entre os Dias 15 e 25 de Novembro de 1966,” Carlos Armando da Mota Cerveira 著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 MU/GM/GNP/ 028E-06-15-40)，第 9 页。

¹⁴ 政府没有回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官方报告这样说：一是村民不能提供他们拥有这些房子的凭证；二是房子的建设不符合政府的新城市建设规划。民间认为这只是政府拒绝建设小学的借口，学校旨在为当地的共产党服务。记者 José Castanheira 给出了另一个原因，他认为公共劳动部的官员没有回应是因为他们的腐败，没有收到贿赂。

¹⁵ 对台帕事件中伤者人数的报道有很大差别：澳门的左派中文报纸《澳门日报》报道 34 名中国人受伤，3 人需住院治疗。警方报道 7 位平民和 2 名警察受重伤，需要医疗监护。《香港星报》（*Hong Kong Star*）报道 13 名警察和 2 位平民受伤。

中文报纸刊登了这次冲突的报道和照片后，这个事件迅速成为整座城市的新闻。台帕特别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给伤者赔款，立即释放被关押人员，惩罚安德雷德 (Andrade) 和警督，立即授权继续修建学校，毁掉所有橡胶警棍，警棍被认为是特别危险的“伤内不伤外”的工具。当地共产党控制的报纸《澳门日报》刊登了这次冲突的照片，列出了伤者的姓名、年龄和职业，严厉谴责了这次由葡萄牙当局挑起的流血冲突。双方都谴责对方策划了这次事件，葡萄牙人声称记者刚好在现场拍下了冲突的整个过程表明整件事都是共产党事前策划好的，左派分子则强调澳门警督那天刚好在台帕，而没有在澳门半岛总部，表明了这次镇压是葡萄牙人事先谋划好的。¹⁶同时，成群结队的学生和工人到医院看望了受伤者，并且从澳门乘渡船到台帕看了事件现场，还听取了目击者控诉葡萄牙警方暴行。

11月30日，台帕事件成为全国性的新闻，大陆的中文媒体，最著名的《人民日报》和北京电台，第一次报道了这件事，谴责葡萄牙人“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 (HKStar, Dec. 1, 1966)。澳门的中文报道非常尖锐，但在谴责这次事件时没有明确使用毛泽东主义谴责这次事件，而是使用了一些极左激进主义语言，称葡萄牙当局是“残忍的帝国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人民不会再被欺负了。澳门的中文报纸还首次报道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此强调葡萄牙的帝国主义者形象。同一天，大约60名学生和工人在澳督府前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他们聚集在门外，高呼口号并大声阅读毛泽东红宝书的内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示威逐步升级，直到1966年12月3日星期六，抗议者要求立即与总督见面，并试图冲进总督办公室，正当警察试图阻止抗议者的时候，流言传开了，说葡萄牙人把一些中国孩子从政府办公楼二楼阳台扔到了街道上。这时，总督府外面的示威者人数开始增长，先是有数百人，后来超过了2000人。防暴警察带着高压水泵和催泪弹来到了现场，把人群被驱散到了城市的其它地方，这更激怒了抗议者。一群年轻人开始进攻葡萄牙统治的象征——位于市中心的公共大楼和纪念碑，他们攻击了公共档案事务所，推倒了主广场上的一座澳门军方“英雄”雕像，并想冲进警局总部。军队被召集来宣布了戒严令，并把坦克开到了狭窄的街道上。到12月4日星期天黄昏，8名中国人死亡（其中5人不满20岁），许多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受伤，另有很多人被捕。当时的澳门总督 José Manuel Nobre de Carvalho 同意了台帕居民的要求，他是一个管理殖民地的老手，曾管理过佛得角和安哥拉，他在台帕冲突发生仅10天后就来到了澳门，直到他的船到达澳门的前几个小时，他才被告知事件不断加剧的紧张态势。

接下来的几周内，葡萄牙当局在澳门面临着一连串不断升级的要求。12月5日，澳门的中国学生联合会提出了5项要求：道歉、处罚、赔款和承诺永远不再使用武力对抗澳门人民。这些要求与早先台帕居民的要求相呼应。澳门的左翼精英分子迅速组织了一个由13位来自工会、同乡会、左翼学校、妇女联盟和中国商会的代表组成的各界代表委员会，委员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提出了6项要求，再次要求道

¹⁶ 在警方最高长官的官方报告中，他说自己那天，作为台帕恢复中心负责人刚好在台帕进行例行检查。

歉、赔款、处罚和承诺，并要求取消戒严令、释放被关押者、承认葡萄牙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罪行。12月10日，广东省外事办提出了自己的4项要求，要求加码，命令把所有与国民党有关的组织和个人逐出澳门，引渡7名于1963年在澳门河被葡萄牙当局逮捕的有嫌疑的国民党间谍。

这些要求几乎一被提出，总督就同意了。到1966年圣诞节，4名在要求中被提到的葡萄牙官员被解职返回葡萄牙，7名国民党间谍也被带到了边境处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且下令禁止悬挂国民党党旗。葡萄牙当局向当地商人借了200万美元用于赔偿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庭。警察不仅不再携带橡胶警棍，他们实际上已停止了管辖工作。同乡会和中国商会组织了一个平民团体来管理交通和公共秩序。唯一的争议就是公开道歉的措词，萨拉查不同意葡萄牙军方被称作“罪犯”。

接下来的两个月，澳门居民受到了境外同胞的鼓励和支持，他们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呼喊革命口号在街道上游行，澳门总督试图通过谈判在强硬的反共产主义的萨拉查和同样强硬的中共之间寻求一个中间立场，但是为失掉果阿仍痛苦不已的萨拉查坚持认为投降就意味着葡萄牙在澳门的主权的丧失，中共也坚持自己的要求应该被无条件满足。中国的炮舰徘徊在澳门周围，数千澳门居民，包括葡萄牙人、中国人、澳门人和其他一些人逃往香港。流言传来说，共产党将要切断电源并向水中投放毒药，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正在准备进攻，大量红卫兵聚集在边境等待入侵澳门的信号，葡萄牙人也正准备完全放弃澳门。香港政府一直密切关注澳门的事件，草拟了秘密计划准备为澳门的葡萄牙驻军（大约1000名士兵）在大规模撤退时提供帮助。¹⁷学生团体组织群众集会，高举毛泽东画像在街道游行。富有的中国人和欧亚混血商人的房屋被乱写乱画，经济活动停止。1月25日，澳门的中国居民被鼓动参与“三不”运动，不缴税、不卖东西给葡萄牙人、不为政府或者葡萄牙个人工作。几天后，萨拉查允许澳门总督自主采取行动处理这些问题，1967年1月29日，总督和他的两个助手身穿平民服装被护送到中国商会的会议室，坐在上方悬挂毛泽东画像的桌子前，喝着茶，签字承认有罪，然后又穿过欢呼的人群被护送出去。

北京方面认为签字表明这次事件的结束。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紧张状态、游行、示威和小冲突不断发生。随着对北京和广州的中共温和派成员的攻击不断增加，当地领导人，比如何贤等发现他们处在一个日益艰难的位置上。1967年7月，一位澳门的葡萄牙公务员给在莫桑比克的朋友的信中描述了当时澳门的几乎无政府状态：群众集会，反抗不列颠和天主教堂的示威不断发生，左翼组织“控制着交通，关闭了街道，随心所欲，我们却束手无策”。他在信中还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葡萄牙士兵想要穿过满是游行群众的街道，结果与游行群众发生了冲突，被拖到了中国商会，（信中简要地写道）这个葡萄牙士兵被要求道歉并赔偿伤者（总是这样的要求）。¹⁸军方领导立即答应了这些要求，这引起了一个负责道歉的上尉的反

¹⁷ 参看 Fn FCO 40/71, 《澳门大撤离》, 1967年1月20日, 公众档案馆, 伦敦。(Evacuation of Macao,” 20 January 1967,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¹⁸ 参看 “Carta particular de Francisco V. de Morais ao Dr. Manuel de Castilho,” PIDE/DGS, SC/CI(2) 867, Torre do Tombo, Lisbon。

抗，他没有穿上白衣准备正式的公开道歉，而是全副武装来到了上司的办公室，随时准备攻击并“解决”一些当地的共产党员，他扇了上司一巴掌并骂他是懦夫，当驻军司令直接下达命令，令其停止这种行为的时候，他才照办。英国领事和副领事在上班途中被拦截，被迫站在人行道上一个粉笔画的小圈子内几个小时，听学生们读《毛泽东文选》。面对这些情况，葡萄牙当局仍是束手无策。一家澳门人因被控虐待他们的中国佣人，他们的房屋、工厂和汽车被一群年轻的激进分子毁坏。

回到里斯本，据报道萨拉查曾这样说过，在澳门的骚乱状态下，有外部迹象表明我们的主权依然存在，如旗帜、货币和一些官方机构，但我们已不再是主权者，仅仅是管理者，在外国的监督下与他方共同管理澳门。这种态度在接下来几年葡萄牙政府对澳门的管理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正如我们采访的两名澳门中国人说的那样，葡萄牙人放弃了对澳门中国人在各个方面的管理，当局并未改革政策以获取中国人民的支持，而是倾向于获取葡萄牙人和澳门人的支持，这样就给个人和平民组织留下了更大的空间来发展经济、教育和社会福利，从而为当地中国人谋利。1976年，政府改革政治，增加了中国人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Lo, 1995），但是即使到90年代末，人们仍然认为，澳门的葡萄牙人“只是北京方面导演的一场剧中的演员”¹⁹。

香港暴乱

和澳门事件一样，香港的骚乱开始于一次警方与抗议者之间相对较小的冲突，随后当地左翼组织和中国政府组织群众集会，提出要求（包括道歉、赔款和承诺，总是这一套）。虽然香港左翼分子认真研究了（很可能帮助策划了）他们在澳门同道的胜利，但他们自己的努力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5月6日星期六下午，在北九龙的人造花厂，管理方拒绝与罢工工人谈判，工人们很沮丧，这时一个不合作的领班冒险出去给卡车装货，工人与其发生了激烈冲突，警察赶到现场，逮捕了21名罢工工人。接下来的几天，工人继续游行示威活动，政府试图促成工人与管理方的谈判也失败了。5月11日，花厂再次爆发了暴动，罢工者连同一些其他组织的人声称要闯入工厂，一些抗议者高呼毛泽东主义的口号，唱革命歌曲，张贴谴责英帝国主义罪行的海报并警告当局不要像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对中国人使用暴力，很明显，这已不是一场简单的劳工冲突了。接近黄昏的时候，警察进驻保护工厂。抗议者向他们投掷了大量的石头和瓶子，警方则使用催泪弹和木制子弹进行回击。晚上9:30时，桐道再安置区及其附近区域实行了宵禁，到早上已有127人被捕。在整个九龙，冲突和骚乱时有发生，公车被毁被烧，商店和政府办公室被洗劫。宵禁持续了三个晚上。英国当局坚持认为这次骚乱是一群无业游民和年轻流氓制造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被人买通的（库珀，1970）。

5月15日，北京外交部和香港贸易联盟发出声明谴责英国警方的行为并提出了惯常的要求：道歉、赔款、处罚和承诺。这使香港事件也成为全国新闻。大量群众

¹⁹ 这句话是我们的一位受访者说的，他是澳门知识分子，1966年正上初中。

聚集起来抗议香港政府，经过几天不断升级的骚乱后，政府最终禁止了公共集会。5月22日，抗议者试图违反这条禁令，因此与警方又发生了一次冲突。这次冲突蔓延速度如此之快，到晚上6:30时，香港强制实行了宵禁，这还是自英国人占领香港以来的第一次。

但是，从这时开始，事情的发展与澳门事件不同了。政府开始不断收到来自各个民间团体的支持声明，包括同乡会、学生联盟和几个行业协会，而在澳门事件中，正是这些人在澳门事件中是反政府运动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到5月末，已有460多个团体出面支持殖民政府（库珀，1970；斯科特，1989）。

六月，左翼分子改变策略，组织了公共汽车、渡口和出租车行业工人大罢工，想以此显示共产党的势力，但是似乎收效不大，只是烦扰了大众的生活。然后，他们又尝试联合抵制政策，拒绝从大陆向香港供应食品，拒绝卸下停靠在香港港口船只上的货物，但是这也只是导致了当地猪肉和蔬菜价格的上涨，并未使他们得到大部分当地人的支持。但是此时，警察和政府机关不断受到攻击，政府对此采取了对抗措施：解雇参与罢工的政府雇员，以煽动言论罪名关闭左派报纸，搜查共产党联盟总部，没收武器，逮捕相关人员。8月，左翼分子开始在公交车站、码头、购物中心、银行、宾馆和政府办公楼放置自制炸弹，一些是有意放置的，一些是随意放置的，并且有真有假。8月24日，一位很受欢迎的电台评论员林彬被拖下汽车，浑身浇上汽油，和他的表弟一起被活活烧死，他以批判共产党而闻名。还是在8月，红卫兵洗劫并烧毁了北京的英国大使馆，以此来抗议英国在香港犯下的不可容忍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尽管有英国当局的保证，大家还是人心惶惶，成千上万的香港居民逃往台湾、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香港的旅游业和投资萎靡不振，股市暴跌。到1967年12月，很显然当地的共产党不仅没有了资金、外界的支持和办法，更重要的是，北京方面的领导不准备再支持他们的活动，以免进一步影响香港和澳门的稳定。到12月，暴乱停止了。根据一名记者的报道，1969年初的香港看起来“与1966年末没什么两样”。但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管理完全地改变了。他们修订了劳动法，通过了新的教育和社会福利政策，加强了公共安全管理，并建立了与公众沟通的新渠道，到20世纪70年代，香港已逐渐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亚洲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并拥有大量的中产阶级。

铭记澳门文化大革命

是什么导致了澳门和香港事件的不同？最普通的回答就是英国和澳门两国能力和特点的不同，英国人“纪律严明”，“有威信”，“有勇气”，果断，敏捷；葡萄牙人组织混乱，腐败，低效，软弱。虽然两地的管理机关对事件的反应不容忽视，但这样的简单分析是关于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原因及背景的静态观点。

我们通过访问事件当事人对这些事件原因、背景和结果的评价，努力想要扩展对比框架，想知道这些事在当事人的生活中有什么长期意义。我们访问了40多个一二三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得到了许多相反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回答，大体看

来，似乎不可能把这些回答综合起来。在我们的访问中，一个重要的争论点是，一二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还是当地人因当地事务发生的冲突。这不是我们向受访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起初我发现这是个非常令人不满意的考虑此问题的方法，因为残忍和荒唐的文化大革命宣称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不仅是全国性的还是全世界性的，那么地方性的运动怎能被排出在外来说明文化大革命呢？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受访者无论如何都倾向于探讨这个问题。在思考人们的这种坚持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人们是如何理解或者否认文化大革命是对殖民主义意义的反映，是对团体性质和澳门与香港或者大陆不同点的反映。

我们访问的大多数人认为一二三事件属于文化大革命，但是不同的解释反应了他们有不同的出发点来定义澳门是一个独特的地区。几个葡萄牙和澳门受访者 60 年代曾为澳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说这些事件不是大陆混乱状态的蔓延，而是几个当地的中国激进分子接收远方的命令精心策划的。他们认为台帕事件不是原因而是借口，目的是羞辱葡萄牙人，一些澳门的中国人也参与进去仅仅是因为害怕不与会受到打击报复。两名与警方和军方都有密切联系的葡萄牙受访者甚至说，那 8 名死者实际上是被共产党的狙击手打死的，想以此来激起骚乱，还或许是被潜入葡萄牙警方的共产党打死的。这些受访者或暗示或直接指出，澳门的无防备的葡萄牙管理部门是中共威胁战术无辜的受害者。²⁰这纯粹是个阴谋，把澳门事件归结为外部恶势力的策划，这种说法不仅能免除葡萄牙人的责任，暗示着整件事有一些违法的地方而受到的谴责；还为澳门的中国人开脱了罪名，我们的中国人是和蔼和热爱和平的，永远不会对我们动一根手指头。从葡萄牙热带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二三事件（正如萨拉查认为的那样）不仅仅是一个转折点，更是一场悲剧，最终葡萄牙失去了澳门的主权，无知和极端主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地方特色，这种阴谋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政府，而且同样的事件也确实在香港英国人身上，唯一的不同点在于英国是真正的殖民者，有更好的装备来保护自己。

同时，其他一些受访者有不同的观点，大部分是当地的中产阶级，有中国人和澳门人。他们把一二三事件归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强调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和适应性，以及不同民族人之间人情味。Jose 是我们的一位澳门受访者，他是 60 年代澳门市政楼的建筑师，他回忆了自己当时站在路边看着过往的游行人群的情形，示威者高呼毛主席口号，挥舞着红宝书，他还在人群中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他只是笑一笑就转移了视线，他说：“这些我认识的的人并不是共产党。杀人、反抗和联合抵制，诸如此类手段根本不起作用，因为澳门是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我们是朋友，许多人还是一起长大的。不管当时的交战状态和意识形态的冒犯如何，人情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后来觉得所有事情都很可笑，包括游行和其它所有行为。”他和其它几位受访者认为 1976 年 1 月的联合抵制政策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朋友和同事，有时候是店主自己，会躲过红卫兵的巡逻偷偷

²⁰ 参看 Carvalho Rodrigo Leal de. 2004. “Depoimento.” In Fernando Lima and Eduardo Cintra Torres, eds., *Macau Entre Dois Mundos*. Lisbon: Fundação Jorge Alvares and Editorial Inquérito. 他认为，澳门葡萄牙人面对中国人的侵略是无防备的受害者，应该感到耻辱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葡萄牙人。

从市场上给他们带来所有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说，仅有的一些受害者是一些顽固分子和骗子，他们积极地参与了虐待当地中国人的活动。人们相互之间的这种心领神会和无声的交往反映了在监控之下，澳门人如何以独特的人情和集体忍耐来超越任何政治。Jose 强调说，澳门很快恢复了正常状态。对他和许多其他人来说，一二三事件不是一个转折点，也不是一个损失，只是一次有许多短期和中期影响的事件，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Jose 与大陆做了一个对比，也与香港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对比，认为，这是大片的没有人情味的地区，在这里军事观念能够而且已经凌驾于人情之上，而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然而，这种差异与其说是葡萄牙的殖民观念和殖民统治造成的，不如说是在澳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葡萄牙体恤和亲民的统治导致的。

另外，少部分我们的受访者的不同观点也非常重要。他们认为把一二三事件归为文化大革命模糊了推动澳门居民参与运动的不同力量，模糊了当地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敌对状态，这些都是导致这次事件的重要因素。安东尼奥是一位已退休的葡萄牙海军军官，他在访问一开始就强调了他自己关于一二三事件原因的看法。他认为“一二三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何贤和他的几个亲信为阻止葡萄牙人把黄金贸易特许权转让给何鸿燊而精心策划的最后一步棋（而且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当地的几个共产党精英，只是想借助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远离资本主义。安东尼奥说澳门社会几乎全被何贤控制，不仅因为他是当局与在澳门和中国的中国人的唯一联系纽带，他还经营银行，控制着码头工人和运输协会，经营私人医院和本城最大的慈善机构，甚至为警方制服买单。葡萄牙当局威胁说如果何贤不给政府更多的利益，就要把黄金贸易特许权转让给外人何鸿燊，当局试图以此来维护其从未拥有过的权力，这种做法是欠考虑的。一二三事件正是何贤对此的回应：一次虽冒险但有力的权力争夺战。

还有一些受访者强烈否认一二三事件与文化大革命联系，他们是几个中国工人和中产阶级，曾积极参与过暴乱。他们坚持说自己的参与不受任何人的指示，而是对葡萄牙当局不理智的、无效的政策和歧视行为的自发反抗。刚好那时毛泽东思想传到了澳门，他们说这是一种表达他们愤怒的有用的语言。他们中的一名记者，当时 14 岁，见证了 12 月 3 日发生的冲突（并在回家吃晚饭的路上朝政府办公楼的窗户扔了一块石头），他给出了一个歧视的例子：

如果你是中国人，而且不得不向政府申请一些东西，仅有的处理这些公共事务的政府人员不是葡萄牙人就是澳门人，他们的一些人非常可恶。所有要填的表格必须都用葡萄牙文，当你上交填好的表格时，即使只有一处拼写错误，他们也拒绝接受。“我不会读这个。”然后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得回家重新填写。“噢，就因为有一处拼写错误。”所以你得重新打印整个表格然后带回来给他们看。“第二行有个单词拼错了。”他们把表格又退给你。他们从来不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只是拒绝接受你的表格。所以你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打印，他们不会在一开始就帮你指出错误，这些人真是太可恶了。那时，这种歧视确实激怒了澳门各个经济阶层的中国人。

另一位一二三事件的目击者（虽然不是参与者）拥有一家小商店，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他的父亲曾在葡萄牙人学校读过书，因此有一些政府高级官员朋友，他提出了更强烈的观点，他说，真正激怒中国人的不是殖民主义本身，而是殖民政府令人费解的方面。

例如，许多公共通知只用葡萄牙文，没有中文版，所以我们不知道通知都写了什么。甚至公共厕所也只有葡萄牙文，当你去公共厕所时，你不知道哪个是男厕所哪个是女厕所，这是很不方便的。我的父亲（曾对他的政界朋友）提起过这个：“这非常简单，只用写上男和女就可以了。”你知道我的父亲得到了一个怎样的回答吗？“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应该学习葡萄牙文。”我的父亲回答说：“即使我接受你的看法，但我们如何学呢？”澳门没有足够的学校和书本，甚至在公立学校也很难买到葡萄牙文课本。

还有一些人认为 1964 年的税收增长是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他们提到了当时小商贩与警察，出租车司机联盟与政府的冲突，都是因为对税收政策不满造成的。这些事件暗示了一二三事件既不是澳门地方特有的也不是殖民压迫的必然结果，而是不理智的、欠考虑的政策和军方管理者的自大顽固，以及基层官僚主义者的无能和腐败造成的。²¹他们把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归结为实用主义，认为一二三事件不可能真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支持。他们还暗示葡萄牙和英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抗实际上是在分别反抗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们所有的目击证人受访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澳门的葡萄牙人不是残忍的帝国主义者（中共这样描述他们），也不是无可指责的帝国主义者（葡萄牙热带主义者这样描述他们），他们只是不幸的帝国主义者，面对这场大规模的动乱完全没有准备。军人、抗议者和观察家以同样的讽刺语气描述了葡萄牙警方镇压暴乱的情况：当他们想要给水泵加水时发现水压不够，投掷的催泪弹罐也因长期放在潮湿的库房里而锈住了，他们只能顺风站着；他们还试图用被白蚁啃噬的面目全非的白藤条盾牌保护自己，悲惨的是，在橡胶弹足够应付暴乱的情况下他们点燃了弹药。

并不是所有的受访者都指责葡萄牙警方的无能，一些上了年纪的澳门居民对这些过去的事情有一种复杂的矛盾感受。如今，澳门回归中国已经八年了，经济的繁荣发展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结构，那些过去的事情看起来已经非常遥远了。一方面，几乎每个人，包括那些认为一二三事件是中国人的“胜利”之人，在说到英国对 1967 年暴乱的反应的时候用的都是正面的措词，与澳门政府的滑稽和软弱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澳门总督签订“承认有罪”的协议并没有使他自己和葡萄牙丢脸，而是他做的唯一一件有实际意义的事情。那些认为葡萄牙政府不关心中国居民的福利导致一二三事件发生的人指出，他们的“胜利”仅仅使葡萄牙政府

²¹ 据另一位受访者所说，对葡萄牙管理制度的失望最终导致了暴乱的发生，而不是人们对毛泽东的热爱和愿意受外国人统治的意识引起了暴乱。1967 年中期，当左派分子攻击天主教堂时没有人再支持他们了，这个事实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对中国居民的管理更退了一步，但是正是葡萄牙政府的无能和他们的无效的政策使澳门维持了“守旧的”惯例和社会机构，这与香港和中国大陆不同，也正是澳门所声称中国特色标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场败战中，至少有一个葡萄牙官员却得到了胜利的。萨拉查的外交部长 Franco Nogueira 在一篇 1967 年写的文章中这样总结一二三事件的后果：“他们说人们在总督签署承认有罪的协议后燃放烟花，大概有一万中国人在庆祝。总督最终成了英雄，不能把这次危机的责任推到他身上，他只是执行公务，不应该为前几届政府的错误负责任。整个事件的处理对我们来说是成功的，而且巩固了对澳门的统治”（Nogueira, 1986: 217—218）。Nogueira 认为葡萄牙的实力不够强大，这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与萨拉查对失去澳门主权的悲叹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许更加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如此多的中国和澳门居民与 Nogueira 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不能用传统的殖民统治和反殖民统治斗争的故事来理解澳门作为一个城市的存在，而应该从折衷和协商的角度来考虑，从部分和不确定的主权声明方面来理解。

结论

我们目前能做的所有结论最多只是假设性的。我在这里所介绍的也只是个粗略的概括，目的是想让大家注意到人们对殖民地政治暴动的复杂和矛盾的记忆。简略起见，我认为没有必要以阶级、种族和政治派别来区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历史转折点和形成时期的统一描述。我们还尝试把我们的调查扩展到包括香港居民，细化我们的分析范畴。另外，虽然对比研究分析对了解两地各自的特点非常有用，但是这种方法模糊了两者间的联系，联系对事件的结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两地的事件中，香港和澳门的左派分子一定是相互合作的，并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教训，接受北京方面的指导。澳门的葡萄牙政府主要依靠香港的帮助、意见和设施（例如，葡萄牙人无法与里斯本直接通过电报联系，所有的通信就只能通过香港来完成）。多亏了澳门的先例，香港的英国人相对确定即使他们采取强硬的立场对抗当地的共产党，北京方面也不会干涉的。

口述历史当然有它自己的问题。我这里所描述的历史最多只是部分的，最坏的情况下是被扭曲的，这是由于受访者不完整的记忆、政治敏感性以及访问员和受访者间的不同互动特点造成的。但是有一点清楚的是，不同种族、阶级和职业的个人用一些术语（如文化大革命、帝国主义或地方利益）来描述 20 世纪 60 年代香港和澳门暴动的原因和结果，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术语，我们还注意到了从他们的不同描述中所得到的意想不到的一致的结论，以及受访者的沉默和欲言又止，这些都使我们平时所理解的殖民主义、主权、合法性和个人概念复杂化了。通过这些概念，民族历史概括了收回外国管理下的土地的重要意义。这些复杂化的概念当然不能被看作是权力的丧失，也不能看作是对外国特权的维护。他们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们对殖民统治和反殖民统治斗争经历的集体记忆是如何有力地导致中国人的不同的，不仅是殖民地内中国人的不同，也包括不同殖民地之间中国人的不同。

（赵洪玮、刘宁译）

作者简介:

凯瑟琳·克莱顿 (Cathryn Clayton) , 美国夏威夷大学夏威夷及亚太研究院副教授和澳门大学研究员。

Contact:

Cathryn Clayton
Asian Studies Program
School of Hawaiian,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Moore Hall 408
University of Hawai'i
1890 East West Road
Honolulu, HI 96822 USA
cclayton@hawaii.edu

译者简介:

赵洪玮,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青岛大学 教授。

刘宁,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历史地理学” 专业 2007 级硕士研究生。